

国际 百越 文化 研究



国际百越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百越文化研究/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 魏桥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

ISBN 7-5004-1427-7

I. 国…

II. ①浙… ②中… ③魏…

III. 百越-文化-研究-文集

IV. K2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335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21.00 元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 编

主 编：魏 桥

副主编：董楚平

编 委：陈国强 蒋炳钊 彭适凡
朱俊明 林华东 陈剩勇

目 录

前言	编 者 (1)
----------	---------

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

比较研究探寻夏文化	陈剩勇 (3)
-----------------	---------

夏、越、汉：语言与文化漫笔	罗 漫 (39)
---------------------	----------

附录：关于《吴越文化新探》的通信	(54)
------------------------	------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及相关问题	汪宁生 (57)
-----------------------	----------

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	〔香港〕饶宗颐 (63)
------------------------	--------------

西周青铜礼器在中国东部的遗存	〔英国〕罗 森 (66)
----------------------	--------------

试论吴、越青铜兵器	肖梦龙 (73)
-----------------	----------

越国鸟图腾和鸟崇拜的若干问题	王士伦 (94)
----------------------	----------

吴、越是否同族？	蒋炳钊 (108)
----------------	-----------

释“瓠”	朱俊明 (123)
------------	-----------

吴越文化三论

——兼与董楚平先生商榷	刘建国 (131)
-------------------	-----------

吴越水利初论	林华东 (145)
--------------	-----------

读《世本集览》的越世系	张良权 (158)
-------------------	-----------

试论吴越携李之战及其史迹	劳伯敏 (168)
--------------------	-----------

试论越国货币形态	陈 浩 (175)
----------------	-----------

楚与吴越文化异同辨	张正明 (186)
-----------------	-----------

绍兴306号墓文化性质的分析

——兼述楚文化对吴越地区的影响 杨叔喜 (194)

吴越音乐文化述略

——兼论其在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发展中的

作用 徐孟东 (206)

吴越舞蹈文化属性论 吴露生 (220)

干将、莫邪的传说及演化 金永平 (228)

“王子攸戈”、“配儿钩鐙”、“臧孙钟”人名

汇考 董楚平 (234)

吴王夫差铜器集录 李先登 (244)

越王剑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香港] 吕荣芳 (249)

越王钟补释 曹锦炎 (255)

西汉越族官印试释 [香港] 王人聪 (263)

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

..... [日本] 林巳奈夫 徐朝龙译 (272)

东夷和百越：对日本方面考古资料的

考察 [日本] 菅谷文则 (292)

百越农业对后世农业的影响 游修龄 (303)

百越人与中国稻作文化 彭世奖 (315)

百越与匈奴衣食住行之比较研究 陈绍棣 (323)

略论扬越、干越和于越对我国冶金术的

杰出贡献 彭适凡 (339)

试论干越及与吴越的关系 李科友 (355)

骆越历史二题 刘美崧 (367)

广东先秦社会初探

——兼论 38 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

墓主人问题……………〔香港〕区家发 (378)

从日本吉野ヶ里所看到的中国江南文化 …………… 安志敏 (401)

日本南西诸岛出土的史前时期贝符

……………〔日本〕国分直一 木下尚子 (408)

外越与日本列岛 …………… 徐建春 (414)

关于日本弥生文化的山城与越文化的关系

……………〔日本〕森浩一 (427)

台湾高山族与古越族的关系 …………… 陈国强 (429)

台湾台东卑南遗址的发掘与相关问题…………〔台湾〕宋文薰 (440)

从细绳纹陶文化的来源论台湾史前文化来源

问题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台湾〕臧振华 (442)

南洋民族的鸟田血统…………〔美国〕徐松石 (452)

马来—玻里尼西亚与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关系

……………〔美国〕杨 江 (459)

多学科研究吴越文化 …………… 陈桥驿 (462)

越文化研究和新方志编纂 …………… 魏 桥 (468)

前 言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著名典籍《吕氏春秋》始称中国南方文化面貌基本相同的许多少数民族为“百越”。这个称呼沿用至今。中国古代的“百”字有时与“全”字同义。“百越”即指所有的越人。近代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研究表明：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直至中国的台湾岛与广大东南亚地区，都分布着古越人。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同中国长江下游关系密切。因此，广义的“百越文化”，分布范围远不止中国南方大陆，它广泛地分布于太平洋西部地区。百越民族有很强的水上活动能力，他们的一些文化特征与水上生活关系密切，因此有些学者称百越文化为“水的文化”、“海洋文化”。它与黄河上、中游的内陆型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后来，由于民族迁徙、血统混杂，各地的越人演变为其他各种民族。

由于百越民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因此，“百越文化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研究百越文化应该逾越现行的国界与行政区域的限制，展开广泛的国际合作与地区合作。浙江是举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反山与瑶山等良渚文化遗址所在地，是越国都城所在地，是百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了把百越文化研究推向深入，成立了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并以两年时间筹备、主办了首届国际百越文化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于1990年8月21日至24日在杭州举行。会议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浙江省文物局以及绍兴、萧山、余姚等市人民政府联合

举办。参加会议的学者有一百多名，收到论文 80 多篇。除中国大陆各学术单位外，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苏联科学院、大英博物馆、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等单位共有 32 位学者出席会议和提供论文。日本考古学耆宿国分直一教授携带 32 件在日本属于国宝级的文物到会展出。

这是一次规格较高、影响较大的国际学术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瞭望》周刊等国家级的新闻单位都作了报道；《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12 期）、《民族研究》（1991 年第 1 期）等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以显要地位作了详细报道。

这次会议的论文质量较高，不少佳作因受篇幅限制未能收入，此书是部分论文的结集。这是第一本具有较高代表性的国际百越文化研究文集，其作者包括许多国际著名学者。我们希望它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百越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使百越文化这个国际性的学术课题，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探讨。

编 者

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探寻夏文化

导论 问题与方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尤其是夏朝前期的历史，对于当代历史学家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疑云弥漫的迷宫。随着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科学考古发掘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否定夏朝历史的疑古派固已不复存在，但关于夏代文明在考古学文化中的地望问题，却至今得不到科学的解答。近年来流行一时的观点，诸如晋南陶寺类型夏文化说、豫西二里头文化夏文化说以及东下冯类型夏文化说等等，如果以历史文献所载夏文化的特征、考古学年代和遗址的考古文化内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审视，可以说没有一个是经得起检验的。这就不能不使某些专家为之悲观，以致宣称真正的夏文化至今尚未真正发现。

在我看来，夏文化探寻缓步不前、进展甚微，问题并不在于真正的夏文化遗址还没有发掘出来，而在于研究者对于夏朝历史

* 本文讨论的“东南地区”这一空间名词，大抵涵盖现今中国大陆的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区的地理空间。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的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构成了与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圈、黄河下游的东方文化圈、辽河流域的东北文化圈等并列的东南文化圈。文中讨论的夏文化，指的是创建夏王朝的主体民族夏人的文化。从时间跨度看，夏文化既涵括夏代（从夏禹至夏桀）这一历史时段中的夏族文化，也涵括夏王朝建立以前的夏族文化，即所谓“先夏文化”。

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偏见，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实际上，夏文化尤其是夏代前期的文化早已经考古学家的努力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只是研究者的传统偏见和方法上的缺失阻碍了人们对于夏文化的认识和发现。阻碍夏文化探讨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症结，从观念上说，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或一个中心说；从研究方法看，当代学者探寻夏文化时，几乎普遍忽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依据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中国文明是由中原地区（或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中心向外漫衍辐射开来的。本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掘的进展，使这种流行二千多年的传统观念发生动摇。现在我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已经有 7000 多处文化遗址如满天星斗般地散布在 1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包括晋南、豫西、山东、陕西等数种类型）、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一系列地域相连而又各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经漫长岁月中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碰撞、冲突、交流、传播、融合，最终由多种区域文化汇聚成为中国文明这一具有共同特征的整体。诚然，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已经被出土的地下文物所打破，但这种神话的衍生物，即东汉许慎《说文》所谓“夏为中国（中原）之人”说，却依然根深蒂固，主宰着当代历史家对于夏文化的探寻和研究，以致于人们探寻夏文化的视野，始终局限于中原一地。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夏”在文献中最初只是夏王朝的专称。《尚书·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等等。在商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殷人自称为“殷”、“商”、“大邑商”等等，而从不称“夏”或“中国”。从甲骨文献中可以看到，殷人以其王畿之地“大邑商”为中心，分称四方之地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对于周边的民族，殷人往往称之为“人方”、“鬼方”、“土方”、“先方”等等。可见

传统“夷夏观”在殷代还不见其影子。

“夏”用以指称中原民族，始于周代尤其是春秋时期。随着周室东迁以后王纲解纽、诸侯力征，边远的小国纷纷问鼎中原。于是，“尊王攘夷”、“华夷之辨”的理论开始在中原姬姓诸侯国中盛行起来。周王族及其宗室诸侯自恃拥有礼乐、教化、衣冠和祭祀文明，乃自称为“夏”、“诸夏”；而贬斥周边的游牧民族为形如禽兽的蛮、夷、戎、狄。如《左传·闵公元年》：“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国语·鲁语》：“以服东夷，而大攘诸夏。”春秋中原人自称的“夏”，其字无疑来自三代王朝之首的“夏”，但此一“夏”字在当时的本义却并非是“中原人”之意。从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时期的“夏”字，其本义为华美或华彩。《周礼·天官》：“秋染夏”，贾公彦疏：“秋染夏者，夏谓五色，至秋气凉可以染五色也。”又《尚书·禹贡》：“羽畎夏翟”，注：“夏翟，翟，雉名，具五色中旌旄之饰。”因此，《左传》、《国语》中往往“夏”、“华”二字互用，如《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国语·晋语》：“和诸戎狄，而正诸华”等等，都可为证。

随着“夏”、“诸夏”、“华”、“诸华”等称谓的规范化和通行化，“夏”字逐渐由表征一代王朝的专称演化为表征地理空间的名词，涵摄着“中国”或“中国人”之意。至于“中国”一词，据考证最早出现于东周的《何尊》：“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治民。”可见在西周时期，“中国”一词所涵盖的地理空间，也还仅仅限于王畿之地，而未有以“中国”称中原地区的。故春秋时人尚有“中国之外有诸夏”^[1]之说。东周以后，“中国”一词所涵摄的外延逐渐扩大，最终由王畿之地的表征演化成为涵括整个中原地区的地域名词。从此以后，夏、诸夏、华、诸华等名词才得以与“中国”一词混一叠合，而这显然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了。

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夏、商、周三代，“夏”都是夏王朝的专

称，其字的本义是华美或华彩。“夏为中国之人”的说法，纯粹是东周以后传统“夷夏观”出现和流行以后的产物。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夏朝由中原人建立的观念，显然是缺乏文献依据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不幸的是，弥漫在夏史之上的传统“夷、夏观”的雾霭尘埃，至今还遮挡住历史家的视野，以致许多学者探寻夏文化时都是先入为主，始终不能拓宽探索审视的视野。

从研究方法上看，当代研究和探寻夏文化的学者们对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有关夏王朝活动区域的记载之上，而没有重视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另一面，即文献所载的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即使是文献记载的夏人的活动区域，学者们也仅仅取其与中原有关的定都迁都的内容，而不顾文献所载夏人在东南地区的活动。实际上，文献中所载夏人在中原定都迁都的地望，大都是秦汉以后人的解说，从夏朝至秦汉时间相隔两千余年，我们不能排除其流传失真的可能性。因此，所谓夏人定都晋南、豫西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可靠的。相对来说，文献所载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夏王朝有关征战、祭祀、婚娶、会盟的活动，虽经两千余年的流传，却不易失真走样。因此，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一部分文献在探寻夏文化时的重要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相对更具价值的文献，却恰恰被历史家们忽略了。

在“夏为中国人”这一背离夏代历史的空间观支配下，当代历史家往往置文献记载的夏文化内涵于不顾，而仅仅根据考古学碳14测定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中原地区的文化遗址，只要在时代上契合甚或接近于文献所载夏朝纪年的中原古代文化遗址，就认定其为夏朝文化遗址。于是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晋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豫西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东下冯类型等等，几乎中原地区的每一重要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都被冠上“夏文

化”的地望所在。一时之间，众说纷呈，莫衷一是。这种不顾历史文献中关于夏文化内涵的记载，而仅仅从时空尺度去探寻夏文化的方法，其局限性和不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夏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其国家形态具有相当的原始性，其疆域更是不甚分明。据记载，夏朝“当禹之时，天下万国”^[2]，尧、舜、共工、驩头、契、稷、太昊、少昊等首领建立的一系列原始国家并存，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犬牙交错。何况，文献记载的夏朝某王的都城地望又多歧义，且久经传说而走样失真，如果不确定夏文化的内涵特征以为标尺，何以鉴定某一考古学文化遗址为夏国、陶唐国抑或太昊少昊国？如上所述，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传统的夷、夏地域观念，研究方法上的种种缺失和局限，以及夏代历史尤其是夏代前期历史的复杂性（即多个原始国家并列、夏朝诸王都邑的流动多徙，如一王一徙甚或一王多徙），凡此种种，不仅使迄今为止对于夏文化的探寻工作难以深入，而且也大大弱化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在我看来，要科学地揭破夏文化迷宫的历史真象，首先必须打破传统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神话，廓清弥漫在夏文化迷宫之上的历史尘埃——传统“夷夏观”，从而拓展夏文化探寻的地理空间；其次，对先秦至于两汉的所有夏文化的历史文献进行一番科学的汇编、整理、考订，从中综合归纳出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以为探寻夏文化的标准尺度。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史前时代主要文化圈的文化面貌进行综合的、全面的考察和审视。我认为，只有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把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结合起来，通过对史前各文化圈文化面貌的综合比较和研究，才有助于使夏文化之谜得到科学的破解。

本文对于夏文化萌生崛起及其地望的探讨，就是基于上述程序和方法进行的。在讨论展开以前，我将根据历史文献，首先确定一个夏文化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根据我对先秦两汉历史文献

中全部有关夏代历史和文化的史料的综合考察、整理和鉴定，我认为，夏文化大抵有以下几项基本内涵，即作为礼器的鼎、玉器（包括圭、钺、璜）、社祀祭坛、夏历夏时、埋葬习俗，以及稻作文化、养蚕织丝、舟楫习水和华彩飞扬的衣冠文化等等。^{*}下面，就让我们以此为标准尺度，依据上面规定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遨游和考察中，去揭破那令人神往的夏文化迷宫吧。

一、夏室宝玉：玉钺、玉圭与夏后氏之璜

玉质礼器，是夏文化的一项重要内涵。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娥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豎，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集解》引孔安国曰：“三豎，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二臣作《典宝》一篇，言国之常宝也。”夏王桀兵败鸣条、仓惶逃窜之时，还不忘携带王室玉器；而成汤将缴获的夏王室玉器视为国宝，二大臣专为此事作《典宝》以歌功颂德，可见玉质礼器在夏代王朝的特殊地位。

夏王朝的玉器包括哪些器形？这些玉器在考古学文化中的渊源何在？其分布规律又是怎样的？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探寻和确定夏王朝尤其是先夏文化的地望，对于揭破夏王朝的萌生与崛起的历史迷宫，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依据历史文献，夏代玉器中一种重要的器形是玉璜。《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左传·定

^{*} 由于篇幅限制和照顾行文的方便，这里仅据文献记载提出夏文化的基本特征，至于据以确定其为夏文化标尺的理由，将留待以下相应的各章中逐一予以讨论。

公四年》载周初封建诸侯、授土授民，“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由于周公辅佐成王有功，其子伯禽因受重封，王室赐之以大路、大旗和夏后氏之璜，夏代玉璜在当时的珍贵由此可以想见。又据《左传·哀公十四年》：宋人“向魋出于卫也，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淮南子·说山篇》：“和氏之璧，夏后氏之璜，揖让而进之以合欢也”，夏后氏之璜与驰名海内的和氏璧并举，可见它是十分贵重的宝器，故《淮南子·精神篇》说：“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

各地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玉璜是史前时代东南地区先民的独创玉器。在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器，其中有璜、玦、管、珠等，在当时，玉璜是东南先民主要的玉质装饰品。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璜这种供装饰用的玉佩饰进一步发展，如崧泽遗址中层共出土玉器 24 件，其中璜就达 18 件之多，器形有长条形、半环形、桥形、半璧形、鱼鸟形；色彩则有墨绿、乳白、黄绿、翠绿、淡绿、湖绿等等，真可谓形制各异、五彩斑斓。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玉璜更是丰富多彩，其文化内涵也更趋深化。迄今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不管是大型墓地还是小型墓葬，都有大量玉璜出土。例如反山墓地出土的四件大玉璜，多置于死者胸前，背面平整，正面略为弧突，平齐的上端正中有一半圆形缺口，两侧各钻一小孔用以系挂。其中三件的正面刻有玉琮上常见的兽面纹（饕餮纹）浮雕。瑶山出土的 9 件玉璜，正面也多刻有精细的兽面纹，如 M34 的半璧形玉璜，由一对圆眼、长方形的巨嘴和两对獠牙组成的兽面图案，狰狞恐怖，给人以威吓神圣感。这时的玉璜，显然已由最初的装饰品一变而为具有宗教性质的礼仪法器。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 7000 多处遗址中，玉璜基本上发现于东南地区的文化遗址中，而为黄河流域、关中等广大地区的史前遗址所不见。虽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某些新石

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偶尔也有玉璜发现，但从形制上看无疑是东南史前文化向北交流传播的结果。可以说，东南地区是中国史前时代各文化圈中唯一流行用璜的地区。

夏王朝玉质礼器中另一种著名的礼器是玉钺。《说文》引《司马法》曰：“夏执玄戊。”《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有神人面鸟身，奉圭以侍。搃矢有苗之样，苗师大乱，后乃遂几。”据考证，大禹所握的天之“瑞令”即指玉钺。^[3]《说文》：“瑞，以玉为信也。”《字林》：“钺，王斧也。”《六韬》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钺。”可见《墨子》所谓“天之瑞令”，即《六韬》所谓天钺，它是三代王权的象征。故禹征三苗，亲握玉钺；汤伐夏桀，“自把钺以伐”；武王伐殷，也“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4]。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推广，青铜钺逐渐取代了玉、石钺。但钺作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却始终为夏、商、周三代沿袭相承的礼制。

作为三代王权象征物的钺（包括玉钺和青铜钺），不论从器物形态上还是从它本身所涵摄的神秘威严的意义上看，都是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石钺的延续。有关专家根据大量经科学发掘与整理、且地层明确的考古学资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石钺的形式、分布地域及其演变，指出：石钺在新石器时代的分布区域，大致可以划分为长江下游地区、黄河下游的山东及其附近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三个区域^[5]：

在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中曾经发现胆形石钺一种，但数量很少，仅在宝鸡北首岭遗址中出土5件；另一种梯形石钺，作工粗糙，使用痕迹明显。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的石钺也不多，且多为实用生产工具。

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及附近地区，石钺出现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器形以梯形石钺为主，也有长方形石钺，这些石钺器形均较厚重，